

爱尔兰最伟大的经典史诗

夺牛记

The Tain

英译者：
[爱尔兰] 托马斯·金塞拉
Thomas Kinsella

插图者：
[爱尔兰] 刘易斯·里·布娄奎
Louis le Brocqy

汉译者：曹 波

湖南教育出版社



爱尔兰最伟大的经典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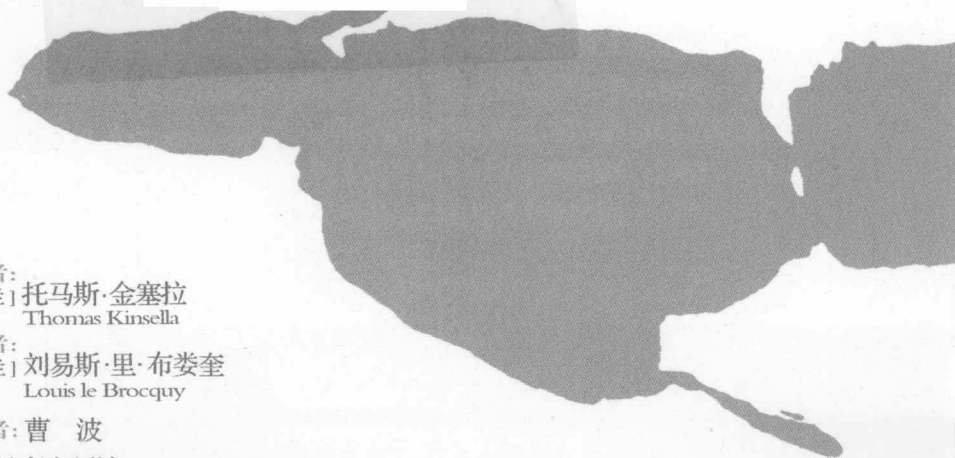
夺牛记

The Táin

英译者：
[爱尔兰] 托马斯·金塞拉
Thomas Kinsella

插图者：
[爱尔兰] 刘易斯·里·布娄奎
Louis le Brocquy

汉译者：曹 波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夺牛记 / (爱尔兰)金塞拉(Kinsella, T.)英译; (爱尔兰)布娄奎(Brocquy, L.)

插图; 曹波汉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4

书名原文: The Táin

ISBN 978-7-5355-5451-2

I. 夺... II. ①金... ②曹...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020892 号

The Táin

Copyright: Text © Thomas Kinsella 1969. Illustrations © Louis le Brocquy 1969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Yingpan Brother Publishing Company,
a division of Huna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18-2007-132 号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www. xdwh. com. cn

实名: 兄弟文化

夺牛记

英译者: (爱尔兰)金塞拉(Kinsella, T.)

插图: (爱尔兰)布娄奎(Brocquy, L.)

汉译者: 曹波

责任编辑: 何莉 李永平 丁丽丹

出品: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 湖南教育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字数: 126 千字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ISBN 978-7-5355-5451-2

出版人: 黄楚芳 李永平

市场总监: 张辉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E-mail: editor@xdwh.com.cn

邮编: 410007

开本: 880×1230 1/32

印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 8.625

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汉译者序

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也是第一个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国家。因为邻国的殖民统治，爱尔兰悠久的文学传统在 17 世纪发生了明显的断裂，分裂为语言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学：盖尔语文学和英语文学。盖尔语爱尔兰文学植根于古老的凯尔特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公元 5—12 世纪，历来倍受贵族庇护又兼任史学家和法学家的本土“诗人”记录了众多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和口头文学，而精通拉丁文的寺院文书在撰写经文笺注和布道词的同时，也在空白页边写上了即兴的创作和传奇故事的插补内容；他们的诗歌、传奇、历史、家谱等手稿在北欧人的入侵中多有毁坏，但一些重要片段在 12 世纪编撰的《入侵志》和《兰斯特记》等古籍中仍然幸存；其中，比较完整的有关远古历史和英雄传奇的手稿，如《厄尔斯特记》、《芬恩记》、《列王记》等，不但是盖尔语爱尔兰文学的宝贵遗产，而且构成了欧洲最古老的地方语言文学之一。17 世纪初至 19 世纪，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强化、抗英伯爵的逃亡和地方经济的衰退，爱尔兰本土文明日渐衰落，盖尔语爱尔兰文学也让位于英语爱尔兰文学：在长期的文化殖民与反殖民斗争中，爱尔兰（本土出生及生活于此的）知识精英借助语言的移植和异质文化的外壳，创造了令宗主国欲据为己有而后快的另一种光辉的文学传统；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涨，英语爱尔兰文学跃上了令人难以企及的巅峰，涌现了肖伯纳、叶芝、贝克特等诺贝尔奖著名作家，以及“文字革命”的先驱和意识流小说的奠基者乔伊斯等。现在，爱尔兰文

学的主流仍然是英语文学,仍然佩带着原宗主国的语言符号。爱尔兰有了独立的民族身份,但文化霸权依然存在,文化身份的独立任重而道远。弘扬文学传统,发现历史传承,扩大国际影响,这是爱尔兰民族确立独立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骤。

四大类早期爱尔兰叙事文学当中,《厄尔斯特记》(另三类是神话故事、《芬恩记》、《列王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五十多个有关古代英雄业绩的传奇故事,是爱尔兰传奇文学的源头和宝库。其中,最长、最重要的当数讲述少年英雄库丘林的丰功伟绩及厄尔斯特王国抗击三国联军入侵的《夺牛记》。比照该版本和其他手稿中的相关插补与笺注,该传奇故事的完整情节就会了然于目:康诺特的王后麦德伍喜好攀比,发现自己比国王阿利尔少一头白角公牛,便派传令官前往厄尔斯特租借棕色公牛,遭拒绝后便联合兰斯特和曼斯特向厄尔斯特发起了夺牛大战;在麦德伍的唆使下,厄尔斯特流亡国王弗格斯引导三国联军夺取了棕色公牛,但三国联军也遭到了弗格斯的养子库丘林的顽强抗击;在日复一日的单挑和怒不可遏的杀戮中,孤胆英雄库丘林战胜了无数凶狠的敌人和受骗参战的同门师兄费迪亚,凭着神勇、机智和义气建立了赫赫战功,叫三国联军谈虎色变;在库丘林悲痛欲绝又遍体鳞伤的当儿,养父舒尔达终于将厄尔斯特人从阵痛中唤醒,让国王康丘佛率领大军赶来,把夺牛大军杀得节节败退,羞愧难当;残余的夺牛大军回到了老家,但是正如当年两个猪倌争斗不休一样,棕色公牛和白角公牛水火不容,结果棕色公牛挑死了对方,自己也在狂乱的奔跑中倒地而亡。故事的寓意似乎显而易见:无论猪倌之间、公牛之间,还是王国之间、王室之内,相互嫉妒的后果就是烽火连绵,两败俱伤。由于其朴实生动的散文语言、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与众不同的民族幽默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夺牛记》被誉为“爱尔兰最切近伟大史诗”的传奇故事,是任何《爱尔兰文学史》都不能略而不谈的盖尔语经典作品,因而必然是爱尔兰文学传统向国外推介的首要重点。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英、爱关系的恶化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爱尔兰文化精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英语文艺作品,而且推动了盖尔语文学传统的有限复苏。在这种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盖尔语《夺牛记》的英译对于爱尔兰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传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世纪中叶之前,爱尔兰爱国学者出版了约十种优秀的英文译本,但由于狭隘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残余、文化霸权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些译本多是节译、略译、编译或者过分归化的不完整的译本,体现了译者借助文化认同谋求强势文化认可的强烈愿望,虽然推动了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复兴与传播,但同时也流露出爱尔兰弱势文化的心虚和对充分话语权的渴望。1969年,通过对《厄尔斯特记》、《兰斯特记》等重要手稿的比照研究,后来长期旅居美国的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金塞拉(Thomas Kinsella, 1928—)不畏强势文化长期以来的偏见和爱尔兰文化传统可能遭到误解的危险,终于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迄今最“忠实”地体现了“原作风姿”的完整译本,在民族独立半个世纪之际借用文学的形式确认了爱尔兰民族传统与欧洲其他民族传统的差异,展示了爱尔兰学者对强势文化的蔑视和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独立的自信,俨然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话语权。因此,在爱尔兰民族去殖民化的长期斗争中,金塞拉的《夺牛记》英译本有理由成为文学翻译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英译本才被爱尔兰艺术家菲恩·甘(Fion Gunn)、“爱尔兰文学交流”基金会和爱尔兰驻北京大使馆选定为汉译的原本,其汉译及相关主题园林在北京的建设也就成了21世纪初爱尔兰—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在同样深受殖民主义危害和维护多元文化共存的中国,在素未谋面却心有灵犀的东方学子当中,遥远的西欧岛国找到了知音。

在爱尔兰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忠实”作为最基本的翻译标准,其幅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起者和译者设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即在大致实现语义对等的前提下,或者尽量使用归化及编译手段,使译文符合英语文学的基本规范,易于为宗主国及本国的英语读者接受,借文学

的接轨达到获取文化认同的目的，或者尽量采用异化和保全手段，保存爱尔兰文化传统的特质，向宗主国及因母语的废弃失去了文化记忆的本国人民亮明自己的身份，借文化的另类达到确立独立的民族身份的目的。对于《夺牛记》的翻译，20世纪中叶之前的爱尔兰译者（如格里高利夫人）走的多半是第一种路线，即删除、简化盖尔语单一手稿中容易在英语文化中造成爱尔兰人好战、残暴、淫乱、狭隘等恶劣印象的素材，选译其中符合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传统的章节，向英语文化传递勇敢却不失优雅的爱尔兰英雄形象。之后的译者金塞拉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在英译中保留了许多体现凯尔特文明的语言细节（如具有文化内涵的人名、地名均采用盖尔语拼法，不使用英语化的拼法；爱尔兰重要的文化术语 *síd*, *chariot-hero* 等也原样移植过来，不使用英语中现成的词汇 *otherworld* 和 *knight*，避免弱势的凯尔特文化被强势的英语文化淹没，而且毫不顾忌多年来强势文化对爱尔兰民族英雄和文化传统的歧视，比照多种手稿译出了当时内容最完整、形象最饱满、情节最幽默的全译本，将曾被殖民主义者据以诬陷爱尔兰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情节（如涉及麦德伍的攀比、淫乱、庸俗，及库丘林的冲动、畸变、嗜血等品性的细节）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体现了爱国学者复兴民族文化传统、反对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的决心和信心。

金塞拉翻译的宗旨、风格和方法与爱尔兰民族一个世纪以来的去殖民化努力是一致的，也是《夺牛记》汉译应该严格遵循的。为此，汉译者不仅竭力履行语义对等、风格切近等译者的通常义务，保留原作口头文学和英雄传奇的特征，以及对“血腥、狂暴、污秽”细节描述的直言不讳，而且力图实现形式对等，保留金塞拉独创的语法结构非常简单、但语义偶尔有些模糊的“阶梯式诗行”（*stepped line*）形式，并按爱尔兰语（而非英语）发音对爱尔兰语人名、地名进行音译（原作中语义非常明显、采用英语构式的术语直接进行意译，而内涵文化意蕴的人名、地名后面通常带有解释性同位语或短句，因而无须进行意译）。此外，汉译者还胆怯地抱着“创优势竞赛”的心理进行了以下调整：

一、将原作的尾注（文本注释）改为脚注，一则方便读者了解英译

者的苦心和版本的异同,二则避免页面变动造成编号错误(原作“文本注释”中第“75、77、79、88、91、92、93”页的注释,实际上分别是第“76、78、80、89、92、94、94”页的注释);

二、增补注释,方便汉语读者理解历史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爱尔兰民族的幽默,减少对殖民主义者曾据以诬陷爱尔兰文化传统的貌似简单的英雄传奇的文化误读(增补的注释都做了注明);

三、根据内容重拟《夺牛记》正文的各章标题,做到言简意赅,又符合传奇文学的规范(由于没有规范、统一的盖尔语文本,由多种手稿编译而成的《夺牛记》仍有内容繁杂、部分情节和视角前后不一的嫌疑,而少数标题也难以概括各自章节的内容,故汉译者窃怀“竞赛”心态,偶行不“忠”之事,并做注明);

四、原文中有的章节有页眉,若保留则排版极易出现错位,因此汉译把页眉转换成小标题;有的章节较冗长或繁杂,汉译者根据情节拟订了简洁的小标题,一则方便排版,二则方便读者查阅(故事插曲长短不一,情节偶有不连贯之处,且原英译文没有小标题;汉译者根据内容和情节添加小标题,但不编号,尽量不影响原文的形式)。

若想深入了解《夺牛记》的文本源头、文学特征、英译本的编译原则和成书过程,请细读金塞拉的《英译绪论》。

若想了解爱尔兰文学的概貌,请参阅:陈恕著,《爱尔兰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12月。

若想研究《夺牛记》在爱尔兰早期文学中的地位和金塞拉英译本在爱尔兰民族去殖民化和文化身份独立过程中的意义,请研读:Tymoczko, Maria,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June 2004.

曹 波

2007年10月



英译者注及致谢

很大程度上,本书的英译一直是我的副业。从我第一次萌动翻译的念头以来,十五年过去了。当时,我只找到了《迪尔德丽》的最老版本,而且对该版本优于通常版本的地方深感震撼,心想以后要更加细致地将《厄尔斯特记》中的其他故事读一读。对于这种温和的冲动带来的困难,我毫无心理准备。书店出售的复述式故事很多,但真正的译文极其罕见,而且我所能找到的通常都很单调乏味。我醒悟到,格里高利夫人的作品《缪斯印尼的库丘林》虽然只是一种解释性翻译,却最好地传达了《厄尔斯特记》的思想。这更突显出一种匮乏,因为甚至作为一种解释性译文,她的书似乎也有重要缺陷:总是祛除原文中的粗俗成分,将原文中的恐怖、怪异因素理性化;此外,作为《厄尔斯特记》的核心,作为西方文学中最古老的方言史诗,散文体史诗《夺牛记》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再现。

《夺牛记》是爱尔兰最切近伟大史诗的作品。鉴于其叙事的各个部分及一些附属性故事,可以公正地说,该作品在传奇文学方面取得了最高成就。可似乎很反常的是,虽然《厄尔斯特记》有了各种传奇化、神话化、诗歌化、戏剧化及删节性的版本,却还从来没有更古老版本的可读性译文,没有稍事整理、借鉴其他手稿加以完善的译文——没有任何我们最早拥有的英文材料来表达故事的思想。于是,我承担起了眼前的这次翻译的任务,并在允许的时间内完成。该书原本不是学术性著作(我既没有这样的动机,也没有这样的知识储备),而是故事的一个活的译本,一个力争在原文和读者之间不留障碍的译本。

衷心感谢所有对本人的翻译给予过帮助的人,尤其是:

博德·斯寇莱瑞齐泰·寇马莱特,感谢他 1963 年提供了 6 个月的研究基金,使得本人翻译的主体部分得以启动;金融部长,感谢他允许本人使用研究基金;詹姆斯·卡尼教授、大卫·格林教授和已故的唐纳·麦克·唐纳,感谢他们对本人事业的无私帮助;

南伊利诺伊大学,感谢他们为本人完成翻译提供了时间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约翰·柯勒尔教授,都柏林大学学院的普罗印夏斯·麦克卡纳教授,以及哈佛大学的吉恩·哈勒先生,感谢他们的友情协助(详见《绪论》);

大卫·格林教授,感谢他为本书第一版的修订提供的帮助;

利安·米勒,感谢他无尽的克制和热情;

以及我的妻子伊林娜,感谢她在我工作的各个阶段给予的帮助。

托马斯·金塞拉



插图者注

一个故事依靠一个民族约 12 个世纪以来的记忆和关注而存在，其插图应该与此相宜，尽量少地带带个人色彩。

早期凯尔特手稿的彩饰不仅表现了个性，而且表现了性情。它们提供的不是对文本的绘画形式的评论，而是文本的延伸。其手段我们现在已无法获得——无论气质上还是技巧上，但从中可以吸取一些与眼前的著作相关的教训。尤其是那些彩饰（如果有的话）表明，绘画图像应该自发生成，甚至从印刷出的文本物质中有血有肉似地生成。

假如这些图像——这些油墨绘制的符号——成了金塞拉《夺牛记》的延伸，那么它们就是一种粗浅的图像。这种图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就像文本本身投下的阴影。

刘易斯·里·布娄奎

于法国卡洛斯 1968 年 11 月





英译者绪论

早期的爱尔兰文学作品许多都已失传了,流传下来的大多记录在中世纪撰写的一些大型手稿中,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有四类故事:

一、神话故事,说的是“达喃女神的部落”(一个古代神祇种族,据称在凯尔特人到来之前就已在爱尔兰繁衍生息了);

二、《厄尔斯特记》,讲述的是国王康丘佛和“大红枝”勇士们(首领是“厄尔斯特之犬”库丘林)的辉煌战绩;

三、《芬恩记》,讲述的是芬恩·麦克·库瓦尔、儿子奥伊辛及菲阿纳其他战士的故事;

四、《列王记》,这组故事说的主要是据称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8世纪期间在位的国王。

其中最古老的手稿是《褐色母牛志》,12世纪由克龙麦克诺塞寺院编撰。该手稿支离破碎,缺陷甚多,但收入了《夺牛记》已知最早版本的片段。同一版本的另一个片段夹杂在一部14世纪末的手稿中,即《黄页利坎志》中,也有诸多缺陷。这两个片段构成了本人英译本《夺牛记》第二至十四章所采用内容的主体。

《夺牛记》的源头比这些手稿古老得多。最早版本的语言可追溯到8世纪,但其中一些诗歌体的篇章可能还要上溯两个世纪,而且大多数凯尔特学者认为,在经由寺院文书之手获取一种文学形式、留下基督教色彩的众多痕迹之前,《厄尔斯特记》及其余早期爱尔兰文学肯定早有一段悠久的口头相传的历史。

至于《夺牛记》的时代背景，一般认为《厄尔斯特记》故事发生的年代与基督时代相近。故事中未受希腊或罗马影响的野蛮世界同高卢和不列颠的拉·特纳石器时期的文明有着相似之处，这兴许就是证据。《夺牛记》和经典作者对高卢社会的某些描述有许多共同点：仅在战争中，共同点就有个人的兵器、士兵的吹牛习惯和勇气，以及夺牛、战车作战和砍头的习俗。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孤立，爱尔兰也许保留了几个世纪前早已在别处消失了的特征和习俗，而且《夺牛记》所描述的那种文化也许在爱尔兰一直延续到了5世纪基督教传入的时候。

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来考虑，《夺牛记》本身缺少许多重要的要素：康诺特入侵厄尔斯特的实际动机，混战的大部分时候厄尔斯特士兵患病的原因，菲格斯反对康丘佛的原因，以及厄尔斯特流亡士兵在康诺特大军中出现的原因。

在个别故事中，最后三项要素都有所交代。许多前传或“之前的故事”都直接导向《夺牛记》。严格说来，那些故事不是“夺牛大战”直接的组成部分，但却是重要的辅助性章节。有些故事讲述了《夺牛记》中国王和英雄的身世、求爱和历险的经历。本人英语译文的开篇就包括一组“之前的故事”，之所以挑选那些故事，是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夺牛大战”的情节和动机。故事的来源在本人的注释中有详细的交代。另有一系列故事则未在本人的译文中出现，那些故事讲述了康诺特建立对厄尔斯特作战的军事联盟的过程和联军供给的情况。

有关入侵厄尔斯特的动机的内容（见本人英语译文的第一章）取自《夺牛记》较晚的一个版本，一个晚4个世纪的版本，其中最出名的副本夹杂在12世纪编撰的另一部重要手稿中，即《兰斯特记》中。

《兰斯特记》版的《夺牛记》的语言可追溯到12世纪，而且流传下来的故事也比较完整。作者或编者竭力创作一个连贯一致又完整无缺的叙事。也许就是因为其完整性，该版本的《夺牛记》得到了编辑和译者的密切关注；其中，斯坦迪西·黑伊斯·奥格雷迪在伊林诺·休尔的《库丘林传奇》（1898年出版）中发表了删节本的译文；厄斯特·温迪齐于1905年出版了该版本的文本连同德语译文；达波伊·德·尤般维尔

于1907年出版了法文选译;约塞夫·丹于1914年发表了英文全译本。最新的译本出现于1967年:“都柏林高级研究所”出版了该文本的新版本,里面包含了塞赛尔·奥拉利的英语译文。

较早版本的《夺牛记》只有一种英文译本已经出版,那就是1904年温尼雷德·法拉德的译本。但是该译本不够完整,读起来也难有愉悦感,部分原因在于该译本完整地保留了原文本的缺陷。

以上兴许就是选用《黄页利坎志》作为重新翻译的原文本的充分依据,但这一较早修订本的实际质量也是选用的重要原因。除了关注完整性之外,《兰斯特记》版的《夺牛记》的编者还展现了一种普遍华丽、多用形容词的语言风格,有时其风格演变成了一种凋谢后的颓败景象。尽管具有种种缺陷,在力图以最佳状态再现故事简朴的表现力方面,这一早期文本似乎还是胜过其他文本。

该早期文本是众人合作的结晶,有些地方几乎就是五花八门的文书活动的碎片式残留物。事件之间有一些重大的矛盾和重复现象,偶尔叙事还会幻灭成隐晦的注释和概要。无关的材料添加了进去,有简单的笺注和评论,甚至有从其他原始素材中成规模地、不加鉴别地插补的内容(有时就贴在被擦除掉的原文章节上)。在其爱尔兰文学简史《回首》中,法兰克·奥康纳说道,因此“《夺牛记》就被改写得简直无法卒读了”。然而,经过些微调整,许多缺陷可以矫正,合理连贯的叙事也可以析取出来。这正是本人英语译文力图做到的:本译文的原则就是,任何对文本的扰乱即使显得十分必要,也应当少之又少。

在本人的译文中,故事里矛盾和重复的现象尽可能得到了清除,模棱两可的地方得以澄清,缺损的地方得以借用其他原文本(通常是《兰斯特记》)加以补充;但这样做也是极尽简约,有时仅仅动了一个词或短语。原文编者或插补者插入的章节只要与本人的整理过程无关,就原封不动地加以保留;这些章节从语言风格的变化很容易辨认出来。这样的材料出现时都做了注明(提出这样的希望是适宜的),句序做了合理调整,其他方面也做了类似修正。读者若渴望了解文本扩展的实际过程,应当能想见原文的混乱。

除了偶尔添加一个词或短语来保障叙事的清晰性(这些词和短语都有注明),本人的译文中没有添加任何材料。但是,本人的译文有两个方面没有完全遵守这一原则。第一个方面与这项工作的主要宗旨相关,即将故事翻译成可读的鲜活译本,就是说,丝毫没有努力保存爱尔兰叙事的实际质地。例如,句子结构和时态就毫不犹豫地改动了;一些要素偶尔从一个句子挪到另一个句子;专有名词取代了代词,反之亦然;动词的不同语域得到了采用,等等。因此,本人的翻译不是直译,但是很切近直译,而且在任何地方都竭力避免与原文偏离太远。

第二个例外与诗歌体的章节相关:诗歌的翻译比散文的翻译采取了更加自由的方式,结构也合理而忠实地得以遵循。然而,在一种诗歌面前,本人的翻译原则不得不完全隐退——整部译文中以台阶形式出现的缩行诗节。在原文中,那些诗节极其晦涩。部分原因在于,正如人们通常相信的,那些诗节更加古老,但是在内容比较“深奥”或具有预言意味的章节中,其晦涩很可能也是故意为之的。学者们基本上宁愿不去触动那些诗歌,但是,尤其在它们与正在发生的故事情节密切相关时,如第六章的长诗序列,努力表达其意义似乎颇为值得。本人的宗旨一直是译出在长度、含糊性和晦涩性方面与原文多少相当的诗节,使其包含可以用爱尔兰语解码的短语、主题和偶然的闪念。要强调的是,本人译出的诗歌是高度推理性的,也许原文的效果即使再现了也再现得很少。没有专家的指点,翻译那些诗节是不太可能的;对于《夺牛记》本身当中的大多数诗歌,本人得到的耐心和慷慨的指点来自都柏林大学学院的普罗伊协·麦克·卡纳博士。他提出的建议成了想象的起点,在随后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暴力,这一点由译者个人负责。本人丝毫没有力图固守爱尔兰诗歌的形式。

要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大量有关《夺牛记》及其背景的具体信息,请阅读塞赛尔·奥拉利《库林格的夺牛大战》的导言。要了解《夺牛记》在传奇文学或者在爱尔兰文学传统中的适当地位,要了解对故事的历史、神话、象征或其他较高层面的评论,请照本书所列书单继续阅读。

学者和注释家仍在研讨这些话题,并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例如在

《凯尔特遗产》中，奥温·布仁里·瑞斯就指出：“《夺牛记》是牧师阶层和士兵阶层之间的经典斗争的范例，双方都想篡夺对方的职权。”亨利·齐·迪马认为，引发夺牛大战的“枕上夸富”一节体现了凯尔特—雅利安父系统治与前凯尔特时期不列颠群岛居民的母系统治之间的冲突。法兰克·奥康纳则认为，故事最古老的一层素材尽管在诗节中保存得并不完整，却组成了一种古代反女权主义讽刺诗的遗存。T. F. 奥莱利相信，《厄尔斯特记》中的故事描述了兰斯特（非康诺特）的尤伊·尼尔族入侵厄尔斯特时的历史环境，而麦德伍——事实上是位于兰斯特的特麦尔或者塔拉的守护女神——当上康诺特的王后，这一观点是作者们的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爱尔兰部落没有王后。

对这些及类似话题的探讨不在本书的视阈之内，但呈现在眼前的《夺牛记》有一些特征似乎应当予以评说。例如，显而易见的是，即使考虑到以后有所插补，整个故事也根本没有统一的叙事语气：有些地方是以中立现实主义的语气讲述的，别的地方则带有民族幻想的色彩。还有一点显而易见的是，叙事的语言质量或传统质量有时比一致性更重要：例如芬娜瓦尔在第七章羞愧而死，后来却活过来同库丘林“住在一起”，这是为了说书人能在故事结尾有所炫耀，而这种炫耀同“库丘林向爱娃求婚”结尾时的炫耀确实是不一致的。同样，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战斗英雄的名单中很可能有一些已经过世或者不在场的人；不管多少已经战死，马纳七子依然是七子；一个又一个英雄不愿迎战库丘林，就因为他是嘴上没毛的小子（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作战神勇）；库丘林发誓，只要一遇见麦德伍就必定要了她的命，但在故事结尾时却错过了机会，因为他是“不杀女人的人”——可是，事先他刚杀了麦德伍派来欺骗他的两名吊孝的女子（更不用说第五章误当作麦德伍杀害的罗秋，以及“库丘林向爱娃求婚”当中的伊斯·恩沁）。但这样的事在史诗文学中是常见的；把它们当作“错误”甚至缺陷，就是误用了现代传统，忽视了这些故事的真实本质，或许还忽视了这些故事口头相传的历史。

《夺牛记》的一个主要要素就是其描述的地貌。依现代标准而言，

地名及其常常显得奇异的意义与词源在本书中占有醒目的位置。一个事件结束时,某处地貌特征得以命名,这常常是合情合理的;的确,有些事件似乎是编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解释某个地名的来源。《夺牛记》正文的高潮部分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决战(可以假定,故事情节正在发展到决战阶段)处理得十分随意,而注意力却细致地导向了遭受致命创伤的棕色公牛在爱尔兰四处逃窜,一路上给各地命名的过程。

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夺牛记》或《厄尔斯特记》;地貌命名在早期和中世纪爱尔兰文学中一直是当务之急,那两个阶段的文学包括一大类地貌学作品,其中有散文册子,也有职业诗人创作的长篇诗歌(一旦提出要求,诗人们得随口背诵出诗歌中的内容)。

对于《夺牛记》的充分欣赏,地貌学要素是至关重要的。许多情节讲的是康诺特联军穿越爱尔兰、在现今娄斯县的部分地域来回征战的过程。我们确信不疑的是,《夺牛记》中一些地名的来历已经辨明,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别的地名无法辨别,要么多年后已被英语地名取代,要么仅仅是适用于许多地方的描述性词语或短语,要是说书人或文书们合理解释或想象的结果。但是,虽然不是完全确定,有许多地名还是可以合理、自信地加以辨别的。总的说来,《夺牛记》的地点感比其地名感、词源感具有浓厚得多的现实主义色彩,而且按其要点追索夺牛长征的路线不是没有可能的。

虽然长征路线图有所简化,没有专家的指点要把这些路线图整合起来却依然是不可能的。本人得到的指点来自哈佛大学的约翰·柯勒尔教授和吉恩·哈勒先生,他们极其慷慨地奉献出自己研究的成果,还极其大方地提出许多建议。不过,他们的发现仍不具有终极性意义,在本人的译作中也体现得毫不适当。眼前译作中的地图仅仅旨在提供足够信息,方便追索故事发展的脉络。

传奇故事中一种常见的要素就是声色之娱的直率:轻易就提及引诱、性交、小便、瘙痒,“库丘林的出世”一节还暗示了乱伦,等等。对格里高利夫人而言,这种粗鄙会令人焦躁不安(她向吉尔塔旦人致信道,“我省略了许多内容,我想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你们对那些内容会毫